

# 从《罗让碑》 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sup>\*</sup>

仇 鹿 鸣

摘 要：《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关键词：《罗让碑》 魏博 罗弘信 谶纬

藩镇割据是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魏博作为河北强藩的典型，对唐中后期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历来不乏学者关注，积累的成果相当丰富。但总括而言，过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中央与藩镇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两大主题展开，<sup>①</sup> 关注的时段多集中于藩镇体制

\* 本文系上海市晨光计划、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的成果之一。本文的写作受益于许多师友的帮助，陈尚君师最初向我提示了《罗让碑》的价值，魏大帅同学帮我调查了罗让碑现状，史睿博士惠示国图所藏《罗让碑》拓本照片；本文初稿曾先后在第四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清华大学“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与会各位同仁的批评建议；并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① 关于藩镇研究的成果极其丰富，可参考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藩镇问题”条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9页。具体到魏博，重要的通观性的研究有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49—417页；堀敏一：《唐五代武人勢力の一形態——魏博天雄軍の歴史》，《中国古代史の視点——私の中国史学（一）》，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第127—143页；韩国磐：《关于魏博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336—355页；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521—532页；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6—255页。侧重于魏博内部军政结构及牙军的研究则有渡边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第54卷第2号，1995年；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

建立及其与唐廷发生激烈冲突的德宗、宪宗时期,对于藩镇日常的政治运作机制的分析则相对薄弱;侧重于对藩镇的政治结构、种族构成、军事体制等方面的研究,而对藩镇内部的意识形态及地方认同等面向注意较少。本文则试图借助《罗让碑》这一新史料,基于地方史的视角,展开对《罗让碑》建立前后魏博历史的微观考察,一方面借助碑文的记载重建罗弘信政变的史实,另一方面则分析《罗让碑》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魏博社会的意义,进而探讨中晚唐河朔藩镇树立巨碑风习背后的文化机制,对目前学界尚关注不多的唐末河北藩镇内部的变化及河朔地方认同的形塑这两个问题加以研讨。

《罗让碑》全称《唐故御史大夫赠工部尚书[长沙郡]罗公[神道]之碑》,<sup>①</sup>龙纪元年(889)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为父罗让所立。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文德年间魏博牙军变乱,拥立罗弘信取代乐彦祯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对罗氏家族的世系源流、婚宦情况,魏博内部的政治结构,其与唐廷、邻藩的关系以及罗弘信执政之初的讷纬等皆有所记述,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研究唐末魏博政治、社会诸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但由于《全唐文》仅录《罗让碑》200余字,无法卒读,<sup>②</sup>其价值一直未被学界注意。直至陈尚君教授编纂《全唐文补编》时,据影印天一阁藏明《正德大名府志》重新辑录,存3000余字,基本保存了碑文全貌,该碑才得以进入学者视野。<sup>③</sup>笔者在此基础上对该碑历代著录情况做了进一步的追索,并在民国23年(1934)编纂的《大名县志》中找到《罗让碑》的另一种录文,文字与《正德大名府志》所载颇有出入。经比对,两种录文各有优长之处,该碑前半部分录文,民国本讹字较少,后半部分则以正德本文字较为优长。总体而言,民国本后半部分所存字数略少于正德本,最后铭文部分多处注有“阙”、“阙下四语”等文字,文避清乾隆讳,可能援据清代某种录文抄入县志。<sup>④</sup>笔者又获悉原碑尚存于世,现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然遍检各种石刻专书及地方文献,未见有相关拓本及录文发表。<sup>⑤</sup>该碑目前位于河北大名县康堤口村南,<sup>⑥</sup>石碑下半部分被埋入土中,露出地面部分的左部已泐,保存状况不甚理想,仅能利用残存文字对录文做有限的校订。后获知国家图书馆藏有《罗让碑》完整拓本,该拓本原系著名金石

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85—648页。新近研究则侧重于检讨粟特胡人在魏博政治中的作用,参见森部豊:《ソグド系突厥の東遷と河朔三鎮の動静:特に魏博を中心とし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41期,2008年。

- ① 据原碑照片校录,□内文字已泐,今据笔划残迹与《大名文史资料》第7辑著录碑额复核后补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1999年,第46页)
- ② 《全唐文》卷813《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94页,检乾隆《大名县志》、咸丰《大名府志》两种清代方志,其所录《罗让碑》的片段文字与《全唐文》所收略同,或与《全唐文》同源。
- ③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90《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97—1101页。
- ④ 洪家禄等纂:《大名县志》卷21《冢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6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415—1422页。
- ⑤ 仅在河北地方出版的方志、文物志、金石志等书中有简单的著录,如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其中《大名文史资料》第7辑所记较详。
- ⑥ 康堤口古墓群为罗氏家族的家族墓地,目前有三座墓,除罗让墓外,另有一座疑为罗弘信墓,20世纪60年代曾遭村民的破坏性发掘,但整个墓群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相关介绍见《大名文史资料》第7辑,第65页。

学家柯昌泗旧藏,<sup>①</sup>除碑额失拓外,大体完整,拓本中部、边角部分文字有残泐,但基本可读。有鉴于此,本文所引《罗让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拓本校录,部分泐损文字酌情据原碑照片、正德本、民国本校补。

## 一、唐末变局中的魏博镇

魏博是安史乱后唐廷为招抚安史降将所置的河朔三镇之一,其后虽屡经叛顺,但自穆宗朝以后,魏博与唐廷之间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认“河朔旧事”为基础的稳定关系。<sup>②</sup>但这一中唐以来形成的奉唐天子为正朔,各个藩镇依据朝廷控制力强弱拥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sup>③</sup>经过黄巢起兵的冲击后,已趋于瓦解。随着唐王朝政治权威的削弱,地方权力日益扩展,藩镇独立化的倾向增强,如何重新定义唐廷与藩镇的关系,是唐末政治演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以唐天子为共主的天下秩序向强藩竞逐过渡的时代大变局中,原本最具独立性、军力最强的河朔三镇,选择何种政治取向,不仅在诸藩镇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当时实际的政治走向更具有重要影响。身处中央失驭的乱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扩张地盘,进而争衡天下或许是任何一个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当然选择。时任魏博节度使的韩简便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韩)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疆。”中和元年(881),韩简以讨黄巢为名,挥师南下,攻取河阳诸葛爽,“因北掠邢、洛而归,遂移军攻郢”。<sup>④</sup>诸葛爽曾在唐廷与黄巢之间多次摇摆,当时奉黄巢之命为河阳节度使,韩简攻取诸葛爽大约尚属师出有名,但其后韩简北掠邢、洛,侵入昭义地界,南攻曹、郢,杀郢帅曹全晟,则无疑是公开与朝廷作对的举动。不仅如此,韩简更有“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韩简的野心激起了邻藩的警觉,曹全晟败后,其牙军将领朱瑄收合残卒,坚守郢州,韩简围攻半年而不能拔。诸葛爽又复取河阳,逐魏博守将赵文□。而在魏博军队内部,连续数年的征战,更激化了牙军与藩帅之间的矛盾。中和三年,韩简与诸葛爽大战于新乡,偏将乐彦祯帅牙军奔归魏州。韩简大败,忧愤而亡,乐彦祯借机取而代之,执掌魏博。

韩简试图凭借魏博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唐廷与河北强藩共同遵守“河朔旧事”的政治默契。所谓“河朔旧事”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等脱离唐廷控制的独立性一面,但对于河北藩镇通过拥立唐天子来获得自己政治合法性的一面关注不够。李德裕曾指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sup>⑤</sup>专制镇冀长达一个世纪的王廷凑家族更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sup>⑥</sup>作为维持家业不坠的秘籍。即使在唐廷威望已荡然无存的昭宗晚期,刘仁恭“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之语,<sup>⑦</sup>亦

① 该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号各地 9654,260 厘米×135 厘米,钐“胶州柯氏藏金石文字”、“临汝张东皕藏”印。

② “河朔旧事”语出《旧唐书》卷 141《田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853 页),可知在经过了德宗时期的反叛与宪宗时期的归顺这一轮回后,以“河朔旧事”来界定河北藩镇与唐廷关系的意识在穆宗初年逐步明确。

③ 关于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及中央对藩镇不同的控制程度,可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77—103 页。

④ 《旧唐书》卷 181《韩允忠传附韩简传》,第 4689 页。

⑤ 《资治通鉴》卷 248,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010 页。

⑥ 《旧唐书》卷 142《王廷凑传》,第 3890 页。

⑦ 《旧五代史》卷 135《刘守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800 页。

可窥见唐廷的正式承认是藩帅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论,河北藩镇对于唐廷亦存有深刻的依附性。而韩简挑衅邻藩,擅杀朝廷节帅,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实质上是在改变河北藩镇自长庆以来形成的与朝廷和睦共处的政治传统。仅从军事而言,南取河阳可以威胁洛阳,进而争衡天下,而昭义所属的邢、洛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脉东麓的战略支点,更是威胁魏博乃至河北三镇半独立地位的心腹之患。<sup>①</sup>韩简的策略并无问题,战争之初亦节节胜利,但魏博武力虽盛,其藩帅的政治合法性却缘于唐王朝的授予,韩简公然挑战百余年来形成的以唐天子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举动,即使在魏博镇内恐怕也很难得到军士的支持。

此外,魏博军队的地域依附性使其缺乏出境作战的动力。前辈学者的研究都已注意到魏博牙军是一支具有极强自利色彩的职业雇佣军,<sup>②</sup>所谓“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寢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踰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sup>③</sup>魏博牙军是一支以依靠丰厚给赐为生活来源的雇佣兵,以在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其成员大都是魏博本地人,父子相袭,世代为兵,内部非常团结,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因此魏博牙军的政治取向是自利性的,经常通过改易主帅来获取经济利益,其在保卫魏博本土时,由于与乡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长时间出境作战,则为魏博牙军所深恶痛绝。所谓“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sup>④</sup>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因此,一旦藩帅本人的扩张欲望与牙军的地域保守性发生矛盾时,便往往成为军镇内部发生动乱的导火线。德宗时,田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sup>⑤</sup>田悦虽能抗衡朝廷的讨伐,但长期战争损害了魏博军队的利益,终为部下所杀。韩简则重蹈田悦覆辙,持续三年战争所带来的军费压力,摊薄了牙军从战争中获得收益,出境作战使得乡土观念极重的牙军被迫远离故土,加之战争中带来的伤亡,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藩帅与牙军之间的矛盾。在韩简仍一意孤行,“三军屡谏不从”之下,魏军临阵退却,转而拥立乐彦祯为主帅,寻找一位更能保证牙军利益的代理人便不足为奇了。

韩简希望借乱世争雄天下的想法,在当时的强藩中并不鲜见,但其扩张性的道路,却与魏博军队保守的地域性格相冲突,最终招致失败。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自唐中期以来便以武力著称的河朔雄藩为何未能在唐末的乱世中取得主导地位,反倒被朱温这样初期实力平平的藩镇取得了天下。河朔藩镇内部的保守性与地域依附性,使其满足于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既得的经济利益,缺乏进一步争竞天下的动力。

取韩简而代之的乐彦祯自然要汲取前任败亡的教训,改变韩简扩张的战略,回到遵从“河朔旧事”的政治传统上来,这从乐彦祯如何处理与唐廷、邻藩的关系中便可窥见一斑。光启二年(886),关中再乱,僖宗奔兴元。朱玫拥襄王煊僭帝位,“诸藩节将多受其伪署”。在此乱局中,

① 关于昭义军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可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的绪论及第2章,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②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585—648页;渡边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第54卷第2号;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349—417页。

③ 《旧唐书》卷181《罗威传》,第4692页。

④ 《旧五代史》卷8《梁末帝纪》,第121页。

⑤ 《旧唐书》卷141《田悦传》,第3845页。

乐彦祯派遣李山甫出使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镕厚谢，卒不克”。<sup>①</sup>乐彦祯联盟河朔三镇共同行动的初衷虽未实现，但比之于韩简利用僖宗幸蜀之际，“自有图王之志”的野心，乐彦祯在同样面对僖宗出奔的政治机遇时，采取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的稳健态度。

乐彦祯时代另一为史家所注目的举动，便是扩建魏州城，“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sup>②</sup>乐彦祯大筑罗城之举，滥用民力，激化了内部矛盾，为其覆亡埋下了伏笔。但唐季乱世，藩镇普遍增筑城池，以求自保，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割据荆南的高季兴，先以“荆南旧无外垒”，始城之，后又“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具”，湖南马殷也曾增筑岳州。<sup>③</sup>而出土的碑志中，亦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如《刘敬瑭墓志》中提到其曾奉命“重修城垒，固护军州。板筑左厢，数旬功就”之事。<sup>④</sup>乐彦祯修筑罗城，本是出于增加魏州防御力量的考虑，并非过分之举。值得注意的倒是乐彦祯修筑罗城以自保与韩简积极扩展地盘的行动相比，更体现了其保守、防御性的政治策略。从以上两事可知，乐彦祯治下的魏博已经放弃韩简时代争雄乱世的扩张战略，转而回归割据一方的河朔传统。

## 二、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

将关注投向内部的乐彦祯，把解决牙军之患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首要任务。自田弘正以后，历任魏博节帅皆是牙军拥立，最终也因不能满足牙军之欲望而为其逐杀，牙军逐渐凌驾于节帅之上，成为左右魏博政治走向的主导力量。亲眼目睹韩简败亡的乐彦祯虽是自牙军而得魏博，却也深知牙军反复无常的性格，深自畏戒，着手削弱牙军。其子乐从训“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希望借此培养亲信的军士力量，取代牙军。此举招致牙军反对，“军人籍籍，各有异议”，双方矛盾激化，乐从训出走相州，牙军发动政变，拘禁乐彦祯，拥立都将赵文□知留后事，乐从训外结朱温为援，反攻魏州。<sup>⑤</sup>关于这场政变及魏博内战的经过，《罗让碑》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可补文献不足：

前副大使乐从训天资勃逆，常畜异图。乃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辄欲更易使衙，以觊非望。我天雄六镇素推忠勇，咸遵正道，肯向邪谋，例皆割耳自明，要縲逆徒。乐从训有所疑忌，易服遁逃，止于近县，使司寻补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兼令摄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犇军器，取索缗钱，使命往来，交午涂路。一日忽潜令部下亲信，掩将征马约数百蹄，欲充军用。阖府疑惧，时议沸腾。乐王自乞避位，忧愤一夕而薨。都将赵文□权知留务事。其年二月八日，乐从训自相州与贼将王周、马武之徒，<sup>⑥</sup>分领马步兵士三万余人。至十二日，**整**我城下，猬毛而起，豕突而来，中外骚然，未免疑

① 《新唐书》卷210《乐彦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38—5939页。

② 《旧唐书》卷181《乐彦祯传》，第4689—4690页。

③ 《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第1751—1752页；《册府元龟》卷410，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877页。关于对唐中后期筑城运动的检讨，可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筑城简史》，《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9—183页。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41—242页。

⑤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4—8378页。

⑥ 按，五代有战将王周，魏州人，事唐庄宗、明宗，参见《新五代史》卷36《王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6页），但时代稍晚，未知是否为一人。马武，又见《新唐书》卷210《罗弘信传》，言其为朱全忠所擒（第5940页），可知乐从训败后，马武降于罗弘信。

惧。赵留后按兵不出，心怀疑贰。众皆激怒。果致变更。监军使及大将、军人已下，比肩扣首，恳乞我仆射权知留务，连名具本陈奏，我仆射辞不获命，上马慰安三军，无不鼓舞，欢呼填咽。郭郭军人，例乞死战，切齿愤叹。聊遣裨将部领二千人，出府南门，逆于贼阵，斩贼将张全素一人首级，其余毙者，不可纪极。贼徒遂退入元城故县。洽浹獠獠，据于府北使国，聚为巢穴，于是百头万计，蚁聚蜂飞。……彼则纵之以强，我则示之以弱。洎二十二日，遣都将梁怀瑾部领兵士三万人，直掩仇围，扫除贼垒。雷奔电击，火烈风趋，未及再时，已闻败北，旋驱旋逐，存者几何。翌日，乃再命偏师，剪屠逆孽，西邸浅口，南至内黄，信宿之间，失于漏网。我仆射遂于金波亭别立牙帐，谓执政曰：“此贼不去，根本犹恐滋蔓。”而乃举明士马，选练骁奇。誓曰：“吾心不斯，有如皎日。”未逾顷刻，投状者数逾十万，遂于小球场内，一一阅试……我公乃令各分部件，俱拥师徒，所谓孙吴指顾，临轩见虎翼之形。翦起虚徐，俯砌识鱼丽之势。一战而霸，此之谓乎？有间者云，贼军已于洹水县屯集，不踰跬步，可以就擒。三月廿六日，乃令都指挥使程公佐，部领马步兵士二万人，于西路而入，次遣都阵后横巡拥阵使尹行方部领马步八千余人，南面而入。时有大六雄小六雄之劲卒，左山河右山河之骁师，平难决胜之诸都，步射横冲之烈将，莫不磨牙啮齿，怒目张眸。……至二十八日，进军逼于洹水县，两军合势，争路而前，贼将王周、马武之辈，领部下凶锋兵士三千余人，逆我大军，未阵而遁。我军于是踰城越堑，拉朽摧枯，旌旗拂云，镗鼓动地。……虽则大获俘馘，未知元恶所之。不信宿，有六雄副兵马使王元武者，斩乐从训首，至于麾下，遂令梟悬于军门之栅，示其众也。

《罗让碑》的叙事虽然是站在政变胜利者罗弘信一方立场上展开的，但结合《通鉴》、正史及相关文献的记载，依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这场政变的认识。从最初的情形来看，牙军与乐氏父子的矛盾有一个逐渐激化的过程。乐从训易服出城之后，乐彦祯命其为六州都指挥使兼摄相州刺史，可见其对于魏博局势尚有一定控制能力，外放乐从训是其与牙军达成妥协的一种方式。六州都指挥使一职使乐从训掌握了除牙军之外的镇军、州军，从而对魏州城内牙军变乱的企图形成震慑。但乐从训不断与魏州城内秘密联系，运输马匹、物资的举动，再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牙军逼迫乐彦祯退位为僧，<sup>①</sup> 拥立赵文为留后，此举蹈袭唐代魏博牙军多次变乱之故智。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乐从训居于相州并握有兵权，牙军废黜乐彦祯后，未能完全控制局势。二月八日，乐从训自相州发兵，十二日抵魏州城下，此为牙军与乐从训较量的第一回合。魏博牙军虽号称精锐，但兵力有限，留后赵文又消极避战，首鼠两端，牙军再次发动政变，拥立罗弘信为留后，成为整个政变的转折点。

罗弘信家族世代为魏博军校，《罗让碑》记其先世甚详。罗让曾祖父罗邠为平州刺史，平州本隶卢龙，以时代推论，颇疑罗邠本隶安禄山麾下，随安史叛军南下，乱平后随田承嗣降唐，定居魏博。田承嗣本“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sup>②</sup> 其割据魏博之初，当有不少同出卢龙者追随左右，罗邠或即其中之一。无论如何，自罗让祖父罗珍起，罗氏世代为魏博军校，据碑文首题，罗让本人的职衔为“唐故魏博节度押衙后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下阙）”。

至于罗氏家族的种族源流，碑文虽自言其出自长沙罗氏，罗弘信后受封为长沙郡王，其子

① 《罗让碑》记此事有所隐晦，据《资治通鉴》卷257考异引《实录》：“彦祯惧，自求避位，退居龙兴寺，军众迫令为僧”（第8374页），更近事实。

②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第3837页。

罗绍威亦袭长沙郡王爵,<sup>①</sup> 可知其家族发迹后确以长沙为郡望。但两《唐书》、《旧五代史》皆云罗弘信为魏州贵乡人,未言其郡望,《罗让碑》亦云其葬于贵乡县迎济乡蔡村,可知其家族早已著籍于魏州,所谓长沙罗氏之说恐是罗弘信显贵之后附会郡望。《元和姓纂》云罗姓为“祝融之后,妘姓国,初封宣城,徙岷江,周末居长沙”,<sup>②</sup> 长沙为罗姓源流之一,《世说新语》注引《罗府君别传》叙罗姓源流:“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sup>③</sup> 《通鉴》胡注引《姓谱》则云“罗本颡项末胤,受封于罗国”。<sup>④</sup> 可知《罗让碑》所谓“其先颡项之后,受族于罗,因为著姓”及《罗周敬墓志》“其先颡项之后胤也,封于罗,以国为氏,地连长沙,因家焉”之说,盖本以上诸说杂糅而成。又《新五代史》本传所谓“罗绍威字端己,其先长沙人。祖让,北迁为魏州贵乡人”,<sup>⑤</sup> 据《罗让碑》可知所记有误,罗氏定居魏州的时间远在罗让之前。颇疑罗氏北迁说乃是在长沙郡望说出现之后,为弥缝魏州与长沙两个地望之间的矛盾而造作出来的。其实,唐代河北本是胡汉杂糅的区域,加之罗弘信家族很可能是从临近边塞的平州迁来,其族属来源颇为可疑。魏博历任节度使中出于胡人而冒称汉人大族者并不罕见,如何进滔一族本为粟特人,但何弘敬墓志中则自称为出自魏晋名族庐江何氏。<sup>⑥</sup> 而罗为唐代常见蕃姓,<sup>⑦</sup> 姚薇元考西域罗氏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罗之后,<sup>⑧</sup> 安史乱军中西域胡人颇多,罗氏或出自于此。<sup>⑨</sup> 罗让妻自云出自广平宋氏,似乎为中古名族,但由于唐人素有妄举姓望的习惯,其可靠性亦颇可质疑。<sup>⑩</sup> 《朝野金载》便有一条言及胡人冒广平宋氏之事:“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sup>⑪</sup> 三世居于汉地便可自称名门,唐人风习可见一斑,至于普通汉人自云名门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罗让二女分别嫁给节度别奏王知言、经略副使赵袭,节度别奏、经略副使二职皆为藩镇文职僚佐。可知,当时罗氏家族的通婚关系集中于魏博镇内,这与其家族地位及当时社会风气相符。藩镇内通过婚姻、结拜、假子等手段形成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从而加强自我认同与凝聚力,是唐后期习见之事。待罗弘信执掌魏博后,罗氏家族的通婚网络才逐渐跨出魏博,其与朱温的多次联姻,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反映出家族地位上升后,跨地域通婚才变得普遍与可能。这也是中古家族成长史上常见的现象。

至于罗弘信本人兵变前的地位,史料记载略有分歧。《罗让碑》云:“无何,蔡贼南下,郛寇东侵,中外惊扰,计无所出,我仆射先领六雄兵士,南自新乡接战;后拥衙卒步射,东至莘县交锋”,似乎他参与了韩简时代魏博与邻镇的战争,且地位颇为显要,至少是兵马使一类的军

① 《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第416页。

②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69页。岑仲勉以为岷江为枝江之误。

③ 《世说新语》方正第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④ 《资治通鉴》卷78,第2483页。

⑤ 《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第415页。

⑥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59页。

⑦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中书藩人事》,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7页。

⑧ 姚薇元认为,另一支胡姓罗氏出自鲜卑叱罗氏,在唐代亦不鲜见。参见氏著:《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0—71、424页。

⑨ 《北梦琐言》卷14《神告罗弘信》云罗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第287页),颇有胡人特征。

⑩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5《邑里篇》记当时风气:“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5页)

⑪ 张鷟:《朝野金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1页。

将，但碑文却未能提供任何罗弘信在政变前的官职，可见碑文所言夸饰成分甚多，不足凭信。《旧唐书》本传未记罗弘信政变前的身份，只言其少从戎役；《新唐书》本传言其为裨将，主马牧；《旧五代史》本传言其为马牧监；《旧唐书》、《旧五代史》本纪云其为小校；《通鉴》记其为牙将；而《北梦琐言》所记最详，言其“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综合各种记载可以判定，罗弘信政变前只是负责牧圉的小校，“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的掩饰之词，<sup>①</sup> 恰恰反映了罗弘信原在军中默默无闻，在此危急关头被拥为主帅，实是异事。

日本学者渡边孝在对成德、魏博两镇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魏博军事结构的特点是士兵集团的集体骄纵，而成德则是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sup>②</sup> 因此，魏博牙军尽管在名义上处于藩镇内部藩帅、军将、兵士这三个层级的底层，<sup>③</sup> 但实质上却是魏博政治的主导力量，稍不如意，便发动变乱，另拥新帅，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之称。<sup>④</sup> 但作为一个自利群体，牙军本身只是一群松散的乌合之众，缺乏明确的领袖，每次变乱，牙军都必须在军将阶层选立一人为帅，作为牙军利益的代言人。而一旦这一代言人为牙军所不满，牙军便再次变乱，从军将层中另立一人，如此循环往复。自史宪诚以来，历任节帅皆是出自军将阶层，为牙军所拥立，得魏博于牙军，同样失魏博于牙军。牙军第一次政变逐杀乐彦祯，拥立赵文□，便是这一出戏码的重演。但牙军的欲壑难填，已在魏博军将阶层与牙军群体中形成了深刻的裂痕，因此乐彦祯及其后的罗绍威虽是自牙军得魏博，但都务求削弱甚至消灭牙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牙军的屡次废立，使得任何觊觎节帅之位的军将坐上这个火山口时，都需三思而后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牙军拥立的赵文□在乐从训兵临城下时态度消极，其本人可能也是被迫坐上这个火山口，对于牙军的反复并无好感。因此，当牙军发动第二次政变、杀掉赵文□之后，已很难再在军将阶层中找到另一个合作者。此时罗弘信自告奋勇，只能说是个人冒险精神加之因缘际会，使其一下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层军官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罗让碑》叙事的一个怪异之处，自罗弘信率军在二月二十二日击败乐从训，将其驱逐至内黄后，至三月廿六日进攻洹水县，杀乐从训之间，《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在这双方生死相搏的紧要关头，却仅用“举明士马，选练骁奇”等事轻轻带过，其间的隐衷需与其他文献比读后方能发掘。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祯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sup>⑤</sup>

可知在乐从训与罗弘信的魏博之争中，朱温曾作为重要的外部势力介入其中，成为左右双方胜败的关键因素。唯朱温介入魏博事务的时间尚存疑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系于四月，《旧唐书·僖宗纪》系于二月，《通鉴》、《新五代史·梁本纪》系于三月。据《罗让碑》可知，罗弘信于三月廿六日大举进攻洹水，击败并斩杀乐从训，则朱温介入魏博事务当在其前，而非其后。据《通鉴》所述，乐从训在二月初战失利后，以朱温行人雷邺被魏博乱军所杀为借口，向朱温

①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4《神告罗弘信》，第287页。

② 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第54卷第2号。

③ 关于藩镇军队内部的结构，参见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

④ 《新唐书》卷210《罗弘信附罗绍威传》，第5942页。

⑤ 《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第10页。



求援，较为可信。<sup>①</sup>《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所记四月戊辰，当是朱温军队班师的日期，而非介入魏博之争的时间。如此便能解释，为何在罗弘信与乐从训生死厮杀之际，《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一个多月的空白。据《旧五代史》，在朱温介入魏博之争后，乐从训曾一度扭转了局势：

文德元年，魏博军乱，乐从训来告急，（葛从周）从太祖渡河，拔黎阳、李固、临河等镇，至内黄，破魏军万余众，获其将周儒等十人。<sup>②</sup>

据载魏军迭遭失败，其精锐豹子军二千人，“戮之无噍类”。<sup>③</sup> 尽管《旧五代史》所述本自《梁太祖实录》等朱温一方的记载，其战绩是否果真如此辉煌尚可质疑。但朱温加入战局后，连下黎阳、临河、李固，解内黄之围，<sup>④</sup> 使乐从训一方起死回生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据《旧五代史》载，罗弘信战败后，被迫“遣使送款于汴”，收买朱温退军，从而重新获得对乐从训作战的主动权。若此，碑文中一段难以索解的描述，或许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我仆射遂于金波亭别立牙帐，谓执政曰：‘此贼不去，根本犹恐滋蔓。’”当时乐彦祯已死，罗弘信被拥立为留后，而碑文中的“执政”谓谁，颇令人感到疑惑。若朱温与罗弘信之间曾经进行过交涉并达成过协议，则此处的执政很可能指的是朱温，朱温于中和四年九月获同平章事衔，虽为使相，但尊称其为执政亦不为过，则碑文此段隐晦地描述了罗弘信与朱温之间谈判的过程，朱温答应允许罗弘信除掉乐从训。至于朱温介入魏博之后，魏军遭遇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罗弘信求和的过程，自然不便于在碑文中加以叙述，只能留下一段隐晦的空白加以掩饰。

### 三、作者与读者：《罗让碑》中的政治书写

我们过去对于河北藩镇的认知，大多建立在两《唐书》等正史的基础上，正史作为形塑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本身就具有借助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的道德训诫功能，因此其对于藩镇的叙事无疑是站在唐廷立场上的，以“叛”、“顺”作为判断的标准，但如能从地方史的视野出发，检讨藩镇内部政治传统与地域认同的形成，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央—地方这一传统分析框架的不足，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的内在机制。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为统一，实分为两部，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sup>⑤</sup> 他特别强调唐中后期，长安与河北在政治、种族、文化等诸方面呈现出的分途之貌，这一经典论述奠定了我们对于唐中后期历史认知的基本框架，而河北区域的胡化特征也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sup>⑥</sup> 但值得关注的是河北区域的文化特质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存在着交错复杂的一面，汉族居民依然是河北的主要人口成

① 《资治通鉴》卷 257，第 8375 页。

② 《旧五代史》卷 16《葛从周传》，第 218 页。

③ 《旧五代史》卷 19《朱珍传》，第 260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57 记乐从训初战失利后，被罗弘信围于内黄。（第 8374—8375 页）《罗让碑》仅记：“翌日，乃再命偏师，剪屠逆孽，西邸浅口，南至内黄，信宿之间，失于漏网。”至三月二十六日，两军再次交战时，战场已移至洹水县，其间的变化完全缺载。

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5—43 页。

⑥ 以最近的研究热点而论，活跃在河北区域内的粟特等胡人民族的墓志及相关考古发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 2 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2—123 页。新近的综合性研究，参见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0 年。

分,儒学在河北地区依然有相当广泛的传播,河北藩镇依然以尊奉朝廷作为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sup>①</sup>因此在忠于朝廷的政治宣传与河北藩镇保持独立地位之间的内在张力之下,河北藩镇如何建构其内部的自我认同是颇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下笔者仅以罗让碑立碑时机的选择、碑文中富有政治宣传意味的表述为例,对此问题略作分梳。

罗让碑立于龙纪元年三月,此时罗让去世已有13年,但距罗弘信执掌魏博尚不足一年。因此这块碑设立的缘起固然缘于朝廷追赠罗让诏命的下达,“既荷褒荣,爰依典实,得以葺修旧茔,建立丰碑”。但毫无疑问,葬礼所展现的是生者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块碑表达出的政治意义对于生者的价值要远大于逝者。

罗让碑的建造对于朝廷与魏博两方面有不同的意义。按唐制,七品以上官员据品级不同可立規制不等的神道碑,碑文的撰写则属于著作郎的执掌范围。<sup>②</sup>事实上,神道碑文的撰述体现了朝廷对于官员一生功业的臧否,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是体认天子—大臣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朝廷政治权威的象征之一。因此重要大臣神道碑的书写,绝非著作郎所能承担,往往由朝中重臣甚至皇帝亲自撰写。如名臣张说死后,议谥不定,朝野纷然,玄宗亲自为张说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文贞”以平息争议,<sup>③</sup>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与本文所讨论的河北藩镇话题直接有关的一个例子则是穆宗时,丞相萧俛以“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为由,拒绝为已故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撰写神道碑文。<sup>④</sup>但萧俛的峻拒无疑只是一个特例,翻检《全唐文》便不难发现,保存下来的河朔藩帅的神道碑、德政碑,其碑文的作者与书丹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与著名文人,其中不乏元稹、王缙、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显赫的名字。可见虽然唐廷无法直接控制河朔,但借助神道碑的书写与建筑,构成了河朔与唐廷确认的君臣关系的重要一环,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制度:

愍帝应顺元年三月,故忠武军节度使孟鹤男遵古上言乞立先臣神道碑。诏今后藩侯带平章事以上薨,许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带平章事及刺史,准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制撰,不在奏闻。<sup>⑤</sup>

这一诏令虽然是后唐愍帝应顺元年(934)颁布的,但必渊源于唐中后期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惯例。罗让碑的刻立亦符合这一典制,罗让生前地位平平,自然够不上朝廷差官撰文的级别,罗让碑的撰者公乘亿为咸通十二年(871)进士,在晚唐颇有文名,前任节帅乐彦祯喜儒术,故援引公乘亿入魏博幕府。<sup>⑥</sup>公乘亿撰此碑时所署结衔“门吏观察判官权知掌书记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大夫柱国赐紫金鱼袋”,掌书记掌表奏书檄,是节度使的喉舌,由他来撰作此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而碑文撰写本身亦受一系列典章制度的约束,需“考其实而文之”,具体写作中则需言必有

① 参见杨志玖:《论唐代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南开学报》1980年第3期;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唐会要》卷38:“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唐六典》卷10:“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2页)

③ 《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7页。

④ 《旧唐书》卷172《萧俛传》,第4478页。

⑤ 《册府元龟》卷61,第686页。

⑥ 公乘亿事迹散见于《新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等处,关于其生平的综合考论,可参见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4页。

据，秉笔直书，“详求家牒，参用国史，论次功行，直而叙云”。<sup>①</sup>一旦碑文褒贬不实，违背朝廷意愿，亦会受到追究。如后唐明宗时，“中书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进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sup>②</sup>神道碑的制作过程亦在朝廷监控之下，五代强藩杨光远神道碑刻立、重建的过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光远死后，“汉高祖赠光远尚书令，封齐王，命中书舍人张正撰光远碑铭文赐承信，使刻石于青州”，<sup>③</sup>但立碑不久之后，为雷击所折，杨光远生前反复无常，时人以为阴责，<sup>④</sup>立碑一事因此中辍。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其子杨承信再次上奏，“亡父光远，蒙赐神道碑，镌勒毕，无故中断。诏别令斫石镌勒”。<sup>⑤</sup>由此可见，无论神道碑文字的书写，碑石的刻立，甚至是断碑的重刻，都在国家权威的严密控制之下。

尽管一般认为，神道碑文充斥着溢美的程序化文字，不过是在虚应故事而已，但实质上议谥、撰文、封赠、刻碑的整个过程是王朝秩序中君臣关系缔结的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文化权威。对于河朔藩帅而言，其生前虽然可以割据一方，藐视唐廷的权威，但在死后依然必须接受这一政治秩序，透过神道碑这一媒介，确认其唐臣的身份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授予继任节度使旌节与赐予去世的节度使神道碑，是一体二面：唐廷通过对生者地位的肯定与对逝者功业的褒扬，在每一次河朔权力更迭之际，完成了对君臣关系的重新确认；而河朔的世袭政治也借助神道碑、旌节这些媒介被纳入唐代国家体制之中，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罗让封赠的获得与神道碑的制作便是遵循这些朝廷与河朔政治关系的成例而展开的。但除了这些成例之外，对于当时的罗弘信，罗让碑的制作更有特殊的意义。

罗让碑高4.2米，宽1.5米，厚0.5米，现位于河北省大名县城北5公里康堤村村南大堤上。<sup>⑥</sup>碑与墓志不同，墓志长埋于地下，不为时人所见，属于一种相对私密性的个人表述；<sup>⑦</sup>而规模宏大的神道碑、德政碑则不同，其往往立于碑主墓前或通衢要道之间，为往来行人所瞩目，是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昭陵陪葬功臣碑的一般高度都在3米多，仅有一些著名的功臣如李靖碑高4.27米、尉迟敬德碑高4.42米，<sup>⑧</sup>与罗让碑规模相若。而罗让生前的地位，自然无法与昭陵功臣相提并论，因而罗让碑的制作承袭了唐中后期以来河北藩镇僭越礼制的传统。河北强藩素有制作巨型碑志的习惯，如著名的何弘敬墓志、何进滔德政碑、安重荣纪功碑，规模之大，远超过实用的需要。目前存世规模最大的唐碑何进滔德政碑高12.55米，宽3.04米，厚1.04米，宋人改刻为五礼记碑。而近年在正定发现的巨型残碑，仅残存的龕肩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整体规模尚在何进滔德政碑之上，学者考证其为五代安重荣纪功碑。<sup>⑨</sup>河北藩镇这种制作巨碑的风习，一般被认为是其骄横跋扈的表现之一。但这种

① 王禹偁：《小畜集》卷28《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07册，原书无页码。

② 《旧五代史》卷40《唐明宗纪》，第553页。

③ 《新五代史》卷39《杨光远传》，第590页。

④ 《旧五代史》卷97《杨光远传》，第1293页。

⑤ 《旧五代史》卷102《汉隐帝纪》，第1358页。

⑥ 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第327页。

⑦ 由于名人所作的墓志往往会通过文集的形式流传，因此墓志、特别是唐中期以后的墓志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私密性的文献，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第49—51页。但无论如何，墓志没有碑这样明显的政治展示的功能。

⑧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

⑨ 孙继民：《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唐史论丛》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

功费亿万的大型制作,能够形成一种传统,除了炫耀其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之外,恐怕还有更实际的效用。

古人素有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的美好希冀,巨型石碑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景观与权力象征,其展示的永久性与纪念性,对于古人的生活世界而言具有深刻的影响。<sup>①</sup>对于无数普通的庶民而言,在其庸碌的一生中可能都从未有机会接触到上层政治,但巨碑作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象征,无疑是庶民了解政治变动的少数管道之一。即使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而言,一块巨碑所展示的政治意义都是不难理解的。至于稍通文墨的吏胥、兵士、乡村文人,便能阅读碑文,通过对碑文的传读宣讲,将政权的意识形态传递给普通庶民。因此尽管魏博各个阶层受制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对于巨碑意义的体认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立碑这一行动本身无疑是河北藩镇政治宣传与权威塑造的重要方式。因此,各种名目的纪功碑、德政碑、神道碑在河朔三镇颇为盛行,与罗弘信为罗让立碑相似的例子在魏博历史上并不鲜见。<sup>②</sup>

而河北藩帅也擅长利用这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作为展现政治立场、引导社会舆论的道具,其中魏博镇内狄仁杰祠的兴废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sup>③</sup>尽管祠堂与巨碑的建筑形式不同,但其所具有的纪念性与政治表演功能无疑是一致的。狄仁杰在武后时曾任魏州刺史,因德政为民所怀,立祠纪念,该祠在安史之乱中遭到彻底破坏。元和七年(812),魏博田弘正归顺朝廷,重建此祠,并撰碑纪念,其碑文云:

洎胡起幽陵,毒痛中邦,腥膻遗余,渐渍毗俗,六十年于兹矣。战血满野,忠魂归天,阶阼之容,隐嶙犹在。元和壬辰岁,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来服。维元侯保和一心,之有众,(此处疑有脱文)举兹列城,表正多方。归职责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凤鸣而皋音革,兰芳而棘刺死,甘醴涌而盗泉竭,庆云飞而浊秽消,四郊廓清,万方丕变,然后辩正封疆,咨谋耄老,得是旧址,作为新祠。<sup>④</sup>

这是一篇极富政治宣传意味的文字,将狄仁杰祠的兴废与魏博叛顺中央的历史紧密勾连在一起。狄仁杰祠因安史之乱而被毁,河朔也不沾王化60余年,而当田弘正决心重奉王化时,选择通过重建狄仁杰祠、刻石纪念这样一个公开的政治仪式来向朝廷和魏博军民展现其归顺的决心。文章中对“胡起幽陵,毒痛中邦,腥膻遗余,渐渍毗俗”强烈而公开的批判,不但与河北俗谓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的社会心理不容,<sup>⑤</sup>更意味着对魏博过去胡化、独立历史的彻底否定,转而决心“归职责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通过对表彰忠臣义士这一儒家、汉式文化传统的恢复,重建魏博对于大唐帝国的政治认同。因此,在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弃胡归汉,彻底否定、变易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魏博的政治文化传统,是田弘正归顺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也是其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也正是因为田弘正无法真正改变魏博的政治文化传统,元和之后,河朔复归于半独立的地位。因此,此时狄仁杰祠的兴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祀典或民间信仰层面的问题,而成为魏博表达对朝廷不同政治态度的重要象征物。

① 侯旭东较早注意到造像记位置的选择背后有对景观效应的考虑,参见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7—264页。

② 另如吴畦《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神道碑》是韩君雄为其父韩国昌所立神道碑,参见《全唐文》卷805,第3754—3755页。

③ 关于狄仁杰祠兴废的研究,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55—257页。

④ 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文苑英华》卷877,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627页。

⑤ 《新唐书》卷127《张弘靖传》,第4448页。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河北这些巨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石碑的树立应该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围绕碑的落成，应当会伴有相当隆重的典礼，从而通过仪式将立碑本身所要传达的政治意义传播出去。但或许是因为立碑这一文化仪式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sup>①</sup>史料中很少有关于碑落成相关典仪的记载，所幸日本僧人圆仁用其“异域之眼”为我们留存下这样一段宝贵的记载：

（四月）九日，开府迎碑，赞扬开府功德政之事也。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左神策军里建之。题云：“仇公纪功德政之碑”。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今上在望仙楼上观看。<sup>②</sup>

圆仁所见的是仇士良纪功碑。武宗会昌元年（841）二月壬寅，“赐仇士良纪功碑，诏右仆射李程为其文”。仇士良是当时势倾朝野的权阉，此碑规制必相当宏大，但由于身在长安，恐怕也不能过份僭越礼制，制作如河北藩镇那样高达10米的巨碑，与昭陵功臣相近约4米左右或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若此则与罗让碑的规模相去不远。从二月下诏立碑，到四月镌碑完成，耗时二月有余，亦可从中推出罗让碑的制作所需耗费的人工与时间。此碑镌成之后，圆仁亲眼目睹了盛大的迎碑仪式，从长乐坊的大安国寺至大明宫南的望仙门，“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整个长安万人空巷，全城争睹，就连武宗皇帝本人亦按捺不住好奇之心，亲登望仙楼，观赏盛况。无疑，通过这一壮丽的仪式，仇士良本人的权势及皇帝的宠遇在公众面前表露无疑；通过目睹此事无数长安官民的口耳相传，亦可进一步发酵立碑一事的政治效应。尽管目前尚不能判断围绕仇士良纪功碑展开的迎碑仪式是特例还是惯例，纪功碑与神道碑在性质上亦有所不同，但考虑到罗弘信在魏博的权势与地位，加之罗让碑中有大量关于罗弘信本人地位合法性的论述，围绕此碑的镌成，应当也有一个相关规模的纪念仪式，宣示朝廷的礼遇，彰显罗弘信取乐彦桢而代之的合法性所在。

就碑文本而言，虽然通常都将其视为堆砌词藻的具文，但它所试图表达的却是方镇最为关心、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而对于罗让碑而言，这种实际的政治功用则更为显著。<sup>③</sup>罗弘信原在魏博军中地位不高，因缘际会被推举为留后，其地位通过与乐从训的殊死拼杀方才获得，其权力的合法性，较之于几位前任皆有所欠缺。因此，罗让碑作为罗弘信上任不久的一次政治合法性展示的机会，虽然出自公乘亿的手笔，其间所表达的却是罗弘信初掌魏博之际急切想要向魏博军民宣示的内容。碑文中的政治表述蕴有丰富内涵，以下分别就碑文中关于朝廷、本镇不同的表述略做诠释。

正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河朔骄藩虽然跋扈，却需借重朝廷官爵以安军情，对于政治合法性较弱的罗弘信而言，朝命的支持对其尤为重要。因此，尽管当时唐廷中央已孱弱不堪，屡经播迁，但罗弘信在碑文中却对朝廷反复颂扬，以强化自己在碑文受众心中的正统地位。因此碑文开篇便提及：“上即位之初，御便殿，顾谓侍臣曰：‘予小子纂承洪绪，克荷丕训，兢兢业业，敢旷万机，凡关于理者，得以施行。’金曰都，帝曰俞，于是诏有司，有大功大效者，不惟爵赏于一身，可以褒赠于三代。我公仆射以

① 如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亲书，可知立碑一事在唐代极为寻常，参见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3页。

② 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3，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

③ 与之相近的例子可以参考王处直墓志，其志文花大量篇幅描述了王处直素有谦退之志，其实是为王都囚父夺位之举寻找合法性解释。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五代王处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4—66页。

忠以孝，奉宸安亲。既荷褒荣，爰依典实，得以葺修旧茔，建立丰碑”，将立碑归因于皇帝的恩赏，从而将为父立碑颂德行动与朝廷对其个人的厚爱联系起来。

尽管通常都将魏博作为跋扈藩镇的典型，但现存关于河朔三镇的碑志中却存有大量忠于朝廷意识的表述，如著名的何弘敬墓志便花了大量篇幅渲染其对朝廷的忠诚。此类文字固然充斥着夸饰不实之词，但在当时的语境下究竟有什么意义，发挥着什么样的政治功能，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何弘敬这种地位的人物的墓志文，绝非仅仅随逝者埋入地下而已，一定还会通过传抄、文集等方式流传于世，<sup>①</sup>因此其所表达的忠义意识虽然是浮泛之言，其所谓的忠义形象更是政治神话形塑的典型事例，但却很难否认诸如此类大量存在的、并通过多种方式流传、呈现的宣传性的文字是构成中晚唐河朔社会知识系统的重要部分。尽管现代史家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很容易指出河北藩镇事实与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但对于生活在历史之雾中的普通魏博军民而言，这种长期的、反复的政治教化对于大众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以下再以魏博军将碑志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平定泽潞战争的态度为例，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检讨。

会昌三年李德裕主持的平定泽潞之役，是武宗时代对于藩镇的重大胜利，一般认为李德裕以承认河朔故事，宣布禁军不出山东为妥协，换取河朔三镇对讨伐泽潞的支持，并委托成德、魏博两镇攻取昭义位于太行山以东的邢、洛、磁三州。<sup>②</sup>若按一般的看法，河北藩镇对于泽潞的平定难免会有兔死狐悲之感，其对邢、洛、磁三州的进攻亦不过是敷衍朝廷而已。但在目前所见的魏博碑志中，恰有代表三个不同阶层的三方碑志提到此次战役：

武宗临轩，命宰臣曰：“潞人不恭，将如之何？”宰臣曰：“从谏孕逆，非一朝一夕矣，潞卒劲悍，请徐筹之。”武宗赫然曰：“我有神将可□叱擒之。宁俟其交锋胜否哉？”翌日，诏御史丞李相国回使于魏。公郊迎，揣知圣旨，谓李相国曰：“肥乡之役，早在梦寐矣。”相国跃马前执公手曰：“社稷之臣，通于神明，信矣。”遂诏除东西招讨泽潞使。不浹旬，统步骑七万众，营于长桥之东。<sup>③</sup>

武宗莅祚初年，逆贼拒命，天讨荐加，常从庐江公以剿叛。庐江公异公英勇，以前冲统道系将累日。公度其军势，相以人心，虽机上之可期，若在彀中耳，谓庐江公曰：“魏师以久不振旅，时无恒心，今乃越境而出，若非肃齐，则冲败莫制。若悦豫其情，则前驱不踵。”公请审其向背，妙以机谋，督馈饷之心，敦战伐之道。在爪牙者，却骈罗于后；如市人者，皆跨列于前，自然表里相应，宽猛得中，此勇之大势也。庐江乃俞良策，卒成大功。<sup>④</sup>

时潞镇不庭，今相国盖代威名，奉天明命，翦除凶丑。公利战行权，授左前冲都知兵马使，匡君为国，巨显输诚。回戈大名，忧勤可拔，署左亲事、马步厢虞候、兼节度押衙。<sup>⑤</sup>这三方碑志的志主何弘敬、韩国昌、米文辩当时的身份分别是魏博节度使、军中大将、中层军将，恰可以代表魏博军中的不同阶层，有趣的是三人的碑志皆将参与平定泽潞之役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功业来加以呈现。就这三篇志文形成的背景而论，韩国昌神道碑是其子韩允忠执掌魏博后所立，该碑文字属于追记性质，与何弘敬墓志一样，是一种公开的政治宣传行动的产物。通

① 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49—51页。

②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26页。

③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8页。

④ 吴畦：《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神道碑》，《全唐文》卷805，第3755页。

⑤ 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文物》2004年第2期。

过立碑及碑文的书写，韩允忠将其执掌魏博的合法性建筑在其家族世代忠于唐廷、累立功勋的基础之上。而米文辩墓志则有所不同，其一生不过是魏博军中的一位普通军将而已，这篇志文除了挚友亲朋之外，恐怕很少有机会被外人读到，因此其文本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而作为一名普通军官，并无必要刻意显现出对于朝廷的“忠”，志文中对“匡君为国”的功绩的强调，固然有墓志格式化叙事的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视为志主自然情感或是社会普遍心理的表达。<sup>①</sup> 在罗让碑、何弘敬墓志、韩国昌碑这些记述魏博镇中核心人物生平官方的、公开性的文本中，作者所设定的阅读与宣传的对象无疑是明确的，除了长安的朝廷之外，这些巨大碑志最重要、最直接的读者无疑就是魏博军民，而这些文本所表达的内容无疑需要符合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尽管限于史料，我们已不可能了解这些读者阅读完文字之后的感受，但罗让碑等文中对于忠义思想的宣扬，或许暗示了他们对于此类文字怀有期待，至少这种表述所构筑的正统、忠义等思想文化观念是能楔入当时河朔的社会情境中去的。<sup>②</sup> 或许正是由于许多普通军民依然怀有“匡君为国”的朴素情怀，对应的在罗让碑等文字中才会对“忠”加以特别的渲染。通过分析这些碑志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忠义观念或许对于魏博的不同阶层而言意味着不同的呈现、意义与理解，但这一思想依然在这些公开或私密的文本中得到反复书写，被作者所强调，为读者所接受，可见忠义思想在胡化的河朔三镇依然是共通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笔者并无意否认已为过去许多研究所证明的河朔胡化与半独立的一面，也不认为上文所述河朔地区存在的忠义意识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种忠义意识很可能是相对的、广义的。魏博军队的特权缘于河朔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当唐廷认可河朔故事时，这种广义的忠义意识可以建构出河朔藩镇对于唐王朝的国家认同，而一旦唐廷试图取消河北的半独立地位、改变魏博的社会经济结构时，这些骄兵悍将自然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而抗命不遵。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注意河北藩镇内部复杂、多元的面向，“忠”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古代帝国体系得以构建的重要的黏合剂。从现实政治而论，没有对忠于朝廷意识的宣扬，节度使与军士之间也很难基于“忠”的纽带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在河北藩镇中常见的通婚、结拜、义儿等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加以弥补，但在事实上，光凭“孝”、“义”这些纽带很难构建起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正由于对朝廷的“忠”与对节度使的“忠”在思想上具有同构性，即使节度使仅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虑，亦不会轻易放弃关于忠义的政治宣传。因此，忠义依然是维系唐廷与河朔以及藩镇内部政治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而对于朝廷的“忠义”形象的构造与展示也是河北藩镇构建自我权力合法性论述的起点。

因而，罗让碑碑文特别强调魏博政变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与承认，将政变的结果置于朝廷合法的政治秩序中。罗弘信将其自立为留后的过程描述为“监军使及大将、军人已下，比肩扣首，恳乞我仆射权知留务”，即在代表朝廷立场的监军使支持下方才受命，而在诛杀乐从训后，又立

① 必须注意到米文辩墓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米为粟特姓，作为胡人，其墓志中表达忠义思想有多少来源于本人，又有多少是源于墓志的格式化语言，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如果做反向思考，一个河朔胡人的墓志也会出现此类表达忠义思想的格式化叙事，亦可以看做大众社会心理的普遍反映。

② 过去对于河北藩镇往往会强调其胡化的一面，但这些胡人在进入中原长期定居，与普通汉族居民有了充分接触之后，其汉文化的程度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但应注意到河北胡化的一面，同时也要注意胡人汉化的一面，从而充分认识河朔社会的复杂性。如最新刊布的一方粟特人米氏墓志，分别由其子孝臣撰文，忠臣书丹，如果说墓志的撰写尚有格套可循的话，那么书丹则是直接衡量出汉文化水平的标尺，可见入华胡人中熏染汉风者亦大有人在。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08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

刻“具状奏陈”，凸现自己恭顺的态度。罗弘信还特别强调朝廷对其的优遇：“伏惟国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亲王遥统节度使，或逾数月而后，方降恩命。今我仆射以殊功难解，茂略济时，进疏才及于阙庭，幢节已交于道路。”这段文字恐怕并非是虚指的具文，背后蕴有当时人所熟知“今典”，其比附的对象当是魏博历史上著名的田弘正归朝时，朝廷给予的殊遇。

田弘正归顺之后，李绹力争即除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而非如惯常那样先暂除留后，予以殊恩，厚加赏赐，以坚定魏博军民的附义之心，此事为元和中兴之业得以达成的关键契机，<sup>①</sup>自然也是魏博镇内口耳相传、妇孺皆知之事，此处罗弘信引田弘正的殊遇自比，以强调朝廷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承认。但事实上，这所谓的殊遇只是罗弘信的向壁虚构而已，并不符合历史实情。《旧唐书·罗弘信传》明确记载：“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sup>②</sup>即罗弘信的得位，恰是严格遵循了“或逾数月而后，方降恩命”的一般惯例，先署为留后，数月后方才正式下达节度使的任命，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当然，罗弘信在碑文中想要呈现的本非历史事实，而是希望魏博军民相信、增进其权力合法性的政治神话。总而言之，罗弘信因缘际会获掌魏博后，为了弥补自己原本在军中威望的不足，不得不极力抓住朝廷之命这根稻草，大肆宣扬朝廷对其宠遇之重，从而为其在魏博的统治涂上更多的合法色彩。而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恰可为李德裕“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一语做出最好的诠释。

在碑文关于本镇事务的表述中，与上文对朝廷的尊崇相对应，罗弘信又隐晦地表达了魏博半独立的地位：“寔自大河之北，太行已东，曹孟德之称孤，将成霸业，袁本初之恃众，遽创雄图”，暗示魏博六镇为可以图霸之地，自居于诸侯的地位。另一方面，罗弘信又必须赋予这场牙军政变以合法性，强调“我天雄六镇素推忠勇，咸遵正道”，将牙军的变乱置于“忠勇”的政治光谱之中，从而达成安抚牙军军心的目的，但对于乐彦祯本人以及其他在牙军变乱中被诛杀的魏博节帅，表达上依然留有相当的余地，尊称其官爵“乐王”、“何中令”、“韩太尉”，保留其在魏博历史叙事中的正统地位。<sup>③</sup>而将事变的所有罪责都推到乐从训身上，言其“天资勃逆，常畜异图”，事实上乐从训的行动无疑是在乐彦祯的授意、支持下展开的，政变结束后魏博牙军就同时将乐彦祯、乐从训父子二人梟首示众。<sup>④</sup>而碑文的叙事刻意淡化了这段血腥的历史，恐是出于维系魏博镇内部团结的考虑，避免在罗弘信、乐从训激烈内战后引起魏博镇的进一步分裂与自我削弱。

#### 四、记忆与诠释：罗弘信的符讖制作

此外，《罗让碑》的叙事中又重建了魏博关于修筑罗城的历史记忆，通过对于事件因果的重新编排将其塑造为罗弘信得位的符讖：“前政乐王一旦大兴板筑，约河门旧堤，计百万人工，开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695—7696页。

② 《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第4691页。

③ 这种叙事方式在《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神道碑》中亦可见到：“昔庐江公承袭一方，子孙三世，建及衰季，始堕弓裘。”（《全唐文》卷805，第3754页）由此可以注意到，尽管唐后期魏博的权力在多个不同的军事强人家族中转换，其间也不乏血腥的杀戮，但这种传递并不破坏魏博内部正统世系的构建与自我认同，即魏博内部，后任节帅的合法性往往是建立在承认前任节帅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同样，权力的内部传递也不影响其与唐王朝之间的政治默契。

④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8页。



八十余里，才克月余，修葺<sup>〔武〕</sup>备。怨嗟之苦，遍于六州，谓之罗城，应我罗氏，岂其天意，符我人事者哉”。罗城的修筑是乐彦祯时代魏博庶民生活中的大事，由于这一工程工期紧促且大量征发民力，以至民怨沸腾，成为乐彦祯丧失魏博人心的关键诱因。而罗弘信一方面以罗姓与罗城相应，将罗城的兴造比附为自己将获政权的先兆，另一方面则利用魏博庶民的集体记忆，诱导他们回忆乐彦祯统治时代的残暴苛酷。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于前一个政权否定与控诉的基础之上，罗弘信借助对魏博人关于修筑罗城记忆的重新塑造，既控诉乐彦祯滥用民力，又加强了自己通过政变推翻乐彦祯的合法性。

但我们注意到，关于罗城为罗弘信执政符应的说法，仅仅在这篇碑文中被提到，《旧唐书》、《通鉴》等传世文献中虽然都有关于修筑罗城的记载，但只是批判乐彦祯滥用民力，没有将其视为罗弘信执政的符谶，反而将另一件神异之事附会在罗弘信身上：

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sup>①</sup>

这一传说流布极广，除《旧唐书》外，《旧五代史·罗绍威传》、《新唐书·罗弘信传》、《通鉴》、《北梦琐言》皆有记载，可以认为白须翁授命这一神异故事在不久后取代了罗城这一符谶成为罗弘信执政合法性的象征，成为官方权威叙事的版本，并被载入各类史籍之中。但是这两个符谶之间的转换与更替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的动力又是如何？可以推想，在政变的混乱局面中，原本默默无闻的罗弘信临时编造了白须翁以土地相授这一故事以让牙军信服，推其为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记载有一定的史实基础。但这一故事与《罗让碑》所要塑造的“监军使及大将、军人已下，比肩扣首，恳乞我仆射权知留务”这一万众拥戴的政治形象严重不符，因此在碑文中被放弃，转而选用魏博人共同关注的修筑罗城一事为题材制造了新的符应。但为何白须翁授命的故事最后又取代罗城的符谶，成为关于罗弘信流传最广泛的传奇，笔者以为这一符瑞知识更替的关键点可能发生在天祐二年（905）：

天祐初，州城地无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谋变，绍威愈惧，乃定计图牙军，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sup>②</sup>

州城的无故自陷为何会成为军人谋变的号召，这本是史文留给读者的一个难解之谜，但如果我们联想到罗城的修筑在当时被认为是罗弘信执掌魏博的先兆，而这一符应随着罗让碑的树立，在之后的十余年中被有意识地大肆宣扬，成为罗弘信执政的重要合法性来源，那么罗城的塌陷，无论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有意地人为破坏，很容易被密谋的军人视为罗氏家族即将灭亡的符应，借机鼓动举事。此时罗城这一符谶在魏博镇内被广泛接受，反而成为罗氏家族的政敌反对他们的武器。当罗氏家族在魏博的统治已趋于稳固，《罗让碑》中所极力塑造的忠于朝廷、为众所推的形象对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与之相关的罗城的符谶反而被政敌所利用，成为政治负担时，那么转而进一步修饰白须翁授命的故事取代罗城这一旧说，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唐中后期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往往也喜好仿效天子，通过符瑞、谶纬的制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收聚人心，例如王处直墓志中便有“长吏屡陈飞走之祥，迭闻稼穡之异”的记载；<sup>③</sup>在发现的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反映归义军时期制作各种瑞应图谶，宣扬天命，强化地方政治认同

① 《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第4690—4691页。

② 《旧五代史》卷14《罗绍威传》，第189页。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五代王处直墓》，第65页。

的案例。<sup>①</sup>而关于罗弘信的两个符谶一显一隐、交替更新的历史则提示我们,符谶作为古代政权合法性构筑过程中所惯常使用的道具,其知识的生产与传布过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危险的知识,符谶在传布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对立的政治双方利用,做出有利于自身的不同诠释,因此随着政治局面的演变,符谶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也随之被不停地更替、改写与发明,被史籍所记载的那种解释往往只是依附历史胜利者的书写才得以流传、定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符瑞解释权的复杂历史过程。<sup>②</sup>

## 五、结 语

罗弘信取代乐彦祯的牙军变乱,从表面上看像是魏博历史上治乱循环固定戏码的再次上演,正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一阵涟漪,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唐廷如故、魏博如故、牙军如故,唯有魏博的主人从乐彦祯换成了罗弘信而已。但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唐末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百余年来牙军的勇武支撑起魏博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在唐廷与节帅间左右逢源,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正是对这种利益链条的路径依赖,使得魏博本身养成了保守的地域性格,无力跨出河朔,争雄天下。在这场政变中,外来的朱全忠势力第一次成为左右魏博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而这正预示着一个巨大变动时代的来临。

本文借助于对《罗让碑》的文本细读,试图跳出中央与地方、胡化与汉化这两个传统的分析框架,借助投入石子所搅动的涟漪,基于对事件的深描,探看隐藏在湖面之下魏博内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罗让碑的建造只是百余年来河朔制作巨碑风气的延续,高耸的巨碑无疑是一种刺目的展示,无声地诉说着河北强藩的骄横跋扈,但形制上的僭越却与文字上的恭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政治文化在“表达”与“实践”层面分裂所形成的内在张力对于河朔地域的民众有何影响,承载着这些重复上演的政治演剧的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谁是这些碑文的读者,作者通过巨碑的形象与文字想要向读者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做出初步的解答,而百余年来河北地域多民族迁徙交融所构筑的复杂文化面貌,并非是用“胡化”与“汉化”这样简单的标签所能涵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抽绎出“胡化”或“汉化”这样单一的概念来描述唐中后期的河北社会,反而会遮蔽很多复杂的文化变迁与互动。陆续进入河北的突厥、契丹、靺鞨、高丽、粟特等胡族,本来就出身不同乃至迥异的文化传统;至于在汉人社会内部,也有着复杂的阶层分野。“胡”和“汉”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概念,而多种文化因子的融汇,复杂的胡胡、胡汉、汉汉多角关系,共同构筑了唐中后期河北社会多元、独特甚至有些模糊不清的文化面目。

〔作者仇鹿鸣,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① 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② 最近孙英刚讨论了“李氏当兴”与“刘氏当王”这两个政治谶言从互相支持变为互相对立的演变过程,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参见氏著:《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

## CONTENTS

---

### *Research Articles*

####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Yunmeng**

Zhou Hongwei (4)

Since the Tang dynasty,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taken Yunmeng (云梦) in the pre-Qin state of Chu to be the name of a specific lake or hunting zone, although they have had different views on its exact location and area. Bu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riginally, *yǔnmèng* was not a proper name but a general term in the Chu dialect of the ancient Xia (夏) or Chinese language; it referred to a body of water used for pleasure outings that was not large but had rich vegetation, and its original meaning was “grassy marsh” or “swamp grass.” This view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seven *yǔnmèng*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located in the Jiangnan-Dongting Lake plain region north 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and the Huang-Huai plain region north of the Huai River. In the Han dynasty, more than one region had a “*yǔnmèng* official.” Besides, in the state (region) of Chu, people had explanations like “a weedy lake is called *yún* (藪曰云 *sǒu yùe yún*),” “*mèng* (梦) means ‘in the marsh’ ” and “*mèng* means ‘in the grass.’ ” The broad distribution of *yǔnmèng* and the deciphering of its true meaning not only enable us to better address the long-standing controversy over *yǔnmèng*, but also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se regions in China’s early history.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Weibo Reg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Luorang Stele**

Qiu Luming (27)

The inscription on the Luorang Stele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reflec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Weibo reg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 period whose continuous turmoil reflects the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generals and garrison soldiers. The self-interested and conservative nature of the garrisons meant that Weibo lost its drive for expansion in the turbulent days of the late Tang. Setting up memorial stel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ols whereby the Tang dynasty strengthened the order that subsisted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subjects. Stele inscriptions, as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erection of very large steles in the mid and late Tang dynasty in what is now Hebei was a way in which military governors demonstrated their legitimacy and shaped their local identification. The Luorang Stele is a good example. Luo Hongxin was of humble origins, so in the inscription he made much of the imperial favors shown to his family and forged auguries and divinations with the aim of consolidating the basis of his rule.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arrogance of the stele’s form and its submissiv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tension between promoting a consciousness of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the semi-independent status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all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Hebei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 **A Study of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Land in the Xixia Language Unearthed from Heishuicheng**

Shi Jinbo (45)

The twelve land sale contracts unearthed from the Heishuicheng site (the Xixia-language contract published earlier plus the eleven newly discovered contracts written in cursive Xixia script published in this article) provid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d sale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the Heishuicheng area in the Xixia dynasty. During the late Xixia perio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asants in the area suffered hardships and had to sell their land in exchange for food, leading to the annexation of land by temples and landlords.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ontracts includes the size of the arable land, the arable land and courtyard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land. From some of the related land sale contracts we can also have an outlin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 of the land and its irrigation channels. The fact recorded in the contracts that some peasants lived wide distances apart on their own arable land shows the